

当然,从理论上讲,国家(政党、政府)应该代表人民,因而在政治传播上应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致。然而,能否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却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在政治传播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决定政治传播整体状态的轴心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而言,这个问题也不能回避。当我们强调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国家(政党、政府)作为“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时,并不排斥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相反,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的政治传播功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理应成为目前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构建的重要战略理论之一。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我们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社会观。马克思当年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国家至上主义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的理想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即国家的消亡、社会的高度自治。但是,马克思也说得清楚,达到这种目标需要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就是说,要达到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需要一个很长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阶段。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国家与社会的紧张,保持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就政治传播主体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说,我们要认识到,政治传播不只是国家(政党、政府)的事情,要在保持国家(政党、政府)主体的主导地位之基础上,肯认“社会”在政治传播中的内在地位与作用。尤其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传播,国家主导的政治传播极易被人理解为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产生天然的警惕和抵触,也很容易对

由国家主导的政治传播产生不信任。而通过社会所实现的政治传播较少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可能在国际受众眼中更为真实可信。因此,将社会中存在的多元利益主体,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拓展政治传播的渠道,改变过去由国家(政党、政府)包揽政治传播的局面,对当下中国的政治传播具有重大意义和迫切性。当然,发挥这些“社会主体”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一方面是,这些主体不被强大的国家权力吞噬,能够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也不能“各说各话”。这就是我们要强调的二者之间保持适度张力、实现良性互动的深刻内涵。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的政治传播功能。

#### 参考文献:

- [1] 张国良. 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199-200.
- [2] 淘涵. 新闻学传播学新名词词典[K].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28-29.
- [3] 邵培仁. 政治传播学[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151.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7.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32.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31.
- [7] [美]阿特休尔. 权力的媒介: 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M]. 转引自张国良. 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张莲英]

## 政治传播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

白文刚

(中国传媒大学 政治传播研究所, 北京 100024)

**摘要:** 政治传播在古代中国政治中居于重要地位, 在王朝合法性的建立、政治文化的传承、日常政治的运转、对外形象的塑造与天朝地位的建构以及王朝的更迭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古代中国政治传播可以为当

收稿日期: 2012-12-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11&ZD075)

作者简介: 白文刚(1975—), 男, 山西寿阳人, 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从事政治传播研究。

代中国政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政治传播；古代中国；地位；作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3)02-0029-04

政治传播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由于政治传播的术语和理论源于现代西方的政治实践，目前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实践和理论还缺乏系统的研究。鉴于此，本文简要阐明政治传播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以期激发学界对其开展深入研究的兴趣与信心。

## 一、王朝的合法性建构离不开政治传播

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权得以和平维持统治秩序、开展有效治理的基本条件之一。古代中国的合法性一词是以“天命”来表示的。任何一个王朝或君王的统治，要获得臣民的认同，都必须表明自身是天命所归。这是其具有合法性的根本依据。如周武王推翻商纣之后，即声称周是“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史记·周本纪》），极力阐明周获得天下是顺应天命所为。

当然，正如学者所言：“很少有与生俱来的合法性政权，合法性政权都是经过或长或短的合法化过程而实现的。”<sup>[1]</sup>古代中国也是如此。由于新王朝的建立有种种不同的背景与方式，王朝的天命并非在政权建立之后马上获得认同，必须通过精心地建构与长期不懈地宣扬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这种天命的建构与宣扬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传播行为。正史中这种天命塑造行为的记载，表明这种政治传播活动在王朝政治中的重要性。

自周代商之后，古代中国就形成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的政治观念。帝王欲得到臣民的合法性认同，不仅要表明王朝的建立是顺应天命，而且要不断地展示自己的圣德，表明自己是以德配天的真命天子，否则就会有失去天命与民众认同的危险。因此，持续建构帝王仁德爱民的形象也是古代中国王朝政治传播的重要任务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各朝继任之君的合法性虽然来自世袭，好像可以依照韦伯所说的“传统的统治”获得合法性，但事实上他们依然需要不断表明自己仁德爱民，具有“上天所要求的（经典上确定的）‘德性’的魅力”<sup>[2]</sup>。这种德性的展示也是通过一系列特定的

政治传播来完成的。在展示圣德的同时，君王还需要依靠以礼仪为中心的媒介来塑造与传播自己的威严，建构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力体系。德威并俱才是一个符合天命的天子形象。

王朝的统治不仅需要臣民对其统治权力的认可，而且需要臣民对其政治行为的认可。如果君王的政治行为得不到臣民的认可，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严重的会导致政权被推翻。周厉王的恐怖弭谤、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王莽的复古改革等行为，皆因得不到臣民的认可而动摇了其政治统治的基础。鉴于此，明智之君非常重视争取臣民对其政治行为的认可，这种争取是通过特定的政治传播活动来获得的。最典型的是征伐他国时的政治动员，如夏启征伐不服其统治的有扈氏，就做《甘誓》，声言“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尚书·甘誓》），为自己的战争行为寻找合法性。后世所谓的师出有名，其实就是强调征伐行为的正当性。

概言之，建构王朝合法性的天命、帝王圣德与威严并俱的形象以及政治行为的正当性，都需要特定的政治传播活动来完成。可以说，没有政治传播，古代王朝的合法性就无法建立与维系。

## 二、王朝的政治文化传承离不开政治传播

政治文化概念的创立者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sup>[3]</sup>。它是影响政治体系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治体系要维持合法性并顺利运转，都离不开其成员在政治文化上的认同。古代中国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古代中国社会在政治文化方面具有令人瞩目的高度一致性，儒家的政治伦理是两千多年中国社会普遍认同的政治文化，也是各王朝建构自身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英国学者芬纳在其享有盛誉的《统治史》一书中感叹说：“它（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主流的社会价值体系相辅相成，这是自从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政府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特别在西方更不曾出现过。”<sup>[4]</sup>显然这种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紧

密耦合的状况是与古代中国政治伦理的水平和政治文化的成功传承有密切关系的。

政治文化的传承需要特定的政治传播活动,即政治社会化。学者们对政治社会化有不同的定义,但总体来看是指政治体系对社会成员开展政治教育与社会成员通过学习获得政治知识、形成政治意识与信仰的过程。由于政治社会化的对象一般是青少年,所以相对于前文所述王朝合法性建构的共时性行为,我们把其视为合法性建构的历时性行为。因为只有政治文化在一代又一代的共同体成员中传承,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延续。

古代中国与政治社会化对应的术语是“教化”。学者指出:所谓教化就是古代中国统治者通过学校教育等途径,将儒家政治伦理文化灌输给社会一般成员,使其接受或认同符合统治者根本利益的理念和观念,自觉成为忠臣、孝子的过程<sup>[5]</sup>。简言之,教化就是儒家政治文化的传播过程。

为了确保“教化”这种政治传播活动的成功,古代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构建了以学校为中心的政治教化体系。作为政治教化的主要载体,从上古三代到帝制结束,除极个别的短暂时期外,学校一直延续,不断发展,成为古代中国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礼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礼记·学记》)其可谓是对古代中国学校功能的精准概括。学校之外,官吏、绅士、宗族、乡约等分别成为不同的教化载体,使教化的范围扩展到几乎每一个帝国臣民。此外,国家还系统地利用政治录用以及表彰忠孝、节烈等活动来规劝民众自觉地接受政治教化。正因为建立了如此完备的教化体系,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才能不断传承、延续,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才能获得长久的支持与稳定。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中国的教化与政治文化认同的努力并非仅仅致力于维持统治秩序,而是有更高远的目标,即使人民具有“美善之品性与行为”<sup>[6]</sup>。所以,孔子认为国家对民众要承担“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的责任。作为四书之首的《大学》也开宗明义地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大学章句集注》)其后才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理念与方法。

### 三、王朝的政治运转离不开政治传播

政治系统顺利运转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有效的政治传播,特别是对于地域广阔的国家来说,这一

点尤为重要,正如伊尼斯所说:“辽阔领土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的传播。”<sup>[7]</sup><sup>5</sup>古代中国就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帝国,因此政治传播在古代中国的政治运转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然,此处所说的政治传播更多的是从政治系统的信息流动与处理着眼,与以劝服和追求认可为目的的政治传播有一定的差异。

基于这类政治传播在古代中国政治运转中的重要性,目前有关古代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多从这个角度着手,对其种类与效果开展探讨。代表性的如孙旭培认为朝廷决策传播、下情上达与监察信息的传播是古代中国政治传播最具特色的环节<sup>[8]</sup>。潘祥辉则以秦汉为例,重点探讨了官僚科层制与政治传播的内在关联,认为古代中国的官僚科层制与信息扭曲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悖论困境<sup>[9]</sup><sup>156</sup>。

事实上,古代统治者早已深刻认识到了政治信息对于政治运转的重要性,明智之君都注意从多种渠道搜集、掌控重要信息,并竭力确保相关信息能够依照统治的需要,在政治系统中准确快速地传播。《国语·周语》有“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的言论,表明至少在西周时期,天子在决策时已经形成了系统地多方面听取信息的制度。在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具体制度虽有变迁,但君主积极通过多种方式搜集、掌控各种信息来服务于决策与控制的统治思路却一直延续下来。

从提高传播效率与加强信息掌控的目的出发,古代中国从媒介技术与制度建设两个方面都作出卓有成效的努力。文字的统一与简化、纵横交错的驰道的建设、遍布全国的驿站的设立,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技术改进来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造纸术与印刷术。作为公认的对世界文明发展具有重要贡献的媒介技术发明,与其说它们的发明提升了传播效率,还不如说它们根本就是政治传播需要的产物。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两项发明在中国诞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依据伊尼斯的理论,轻巧而便于运输的媒介适合信息在空间中横向传播<sup>[7]</sup><sup>27</sup>。因此,地域辽阔的中华帝国内在地需要发明造纸术与印刷术以提高政治传播效率,维系自身的统治。

除不断提高媒介技术外,古代中国还不断通过制度建设来提高政治传播效率,强化对政治信

息的掌控与处置。以清朝为例,在信息输入环节,其在明朝题本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奏折制度;在输出环节,则相应地在明发上谕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密谕与廷寄制度。信息的分类传递提高了朝廷搜集与掌控、处置政治信息的效率。

古代中国虽然高度重视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准确性,但是由于庞大而复杂的官僚科层制,“政治传播中的信息歪曲与失真不可避免”<sup>[9]156</sup>。尤其是在王朝衰败时期,由于官僚体系的腐败,信息更加难以及时地传播。很多王朝的覆灭往往伴随着政治传播体系的崩溃。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政治传播对于王朝运转与维持统治的重要意义。

#### 四、王朝的天朝形象与地位建构离不开政治传播

天下是古代中国最大和最高的政治单位。中国帝王在理论上统治整个世界,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府”<sup>[10]</sup>。但在具体统治实践中,中国帝王并不能真正统治全世界,除能直接派官员巡视行政管辖的疆域外,中国朝廷还需要通过塑造所谓的天朝形象来建构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体系。这种塑造与建构需要通过特定的对外政治传播活动来完成。当然,古代中国的对外政治传播,是对与中国所对应的“四夷”的传播。

首先,新王朝在成立之初,会遣使到知识与能力所及的“四夷”之地,向其国王或首领宣告消息,宣扬新朝取代旧朝的合理性与新朝帝王足堪荣膺天命的圣德,寻求其认同与朝贡。例如明朝成立之初,朱元璋即派使节四处诏谕元亡明兴的消息,宣扬自己“兴举义兵,攘除乱略”(《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的伟大功绩,要求“四方万国顺附”(《明史·爪哇传》),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明成祖即位后,又派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庞大的船队出使西洋,“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传》),传播中华文明于海外,大大扩展了朝贡国的数量。

其次,在朝贡关系建立之后,中国王朝特别注意在朝贡活动中借助多种媒介开展政治传播活动,展示天朝德威与文明,建构以天朝帝王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体系。其一,中国朝廷会依靠制度与礼仪有效主导朝贡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各国的贡期、贡品、表文格式、入境中国的口岸、到达京城的路线以及整个朝贡过程的礼仪,都必须依照中国的规定。在觐见中国皇帝时,朝贡者必须依照中国对

其政治角色的理解被安排在具有明确政治寓意的适当位置参与朝会,并要向中国皇帝行著名的三跪九叩大礼。这种规训式的政治传播,主要目的就是展示中国统治者的威严,建构中国王朝与朝贡者的君臣关系。其二,在完成对朝贡者的规训之后,中国君王会通过颁发谕旨、赏赐礼物等方式展示其怀柔远人的圣德,塑造自身德威并俱的天子形象。其三,除了外国来朝之外,中国朝廷还对关系密切的藩国实行制度性的册封活动。在册封活动中,中国朝廷常常派遣专使前赴藩国,这样做的目的不但在于明确建构、复制与强化中国与册封国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且也是为了有机会让藩国臣民直接目睹与感受德威并俱的天朝形象。

古代中国天朝形象的塑造与天朝地位的建构相当成功。朝贡体系得到长期的发展与维系,一些朝代出现了非常忠诚的藩国。作为中国文明标志的政治伦理、礼仪制度也被一些朝贡国虔诚地学习、践行。这种成功是对外政治传播的成功。

#### 五、王朝的更迭离不开政治传播

王朝更迭是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特征与内在要求。前文已经指出,维护王朝统治并不是古代中国政治的最高目标,养民、教民,使民众具有美善之品行才是政治的最终目的。如果一个王朝腐败暴虐,丧失了其养民、教民的职能,就需要被推翻。《左传》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儒家前有孟子,后有黄宗羲,皆明确主张暴虐之君应该被毫不留情地予以推翻。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王朝更迭才有了其理论上的合法性与内在的动力。

但是,推翻旧有政权必须组织力量,而要组织力量就要制造舆论,开展社会动员。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舆论是万能的,其他一切权力形态皆导源于舆论。”<sup>[11]</sup>古代中国人也认识到舆论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反叛旧王朝的政治活动中,无不重视制造舆论与传播舆论,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

早在商汤伐桀之时,汤就发布《汤誓》,历数夏桀之暴虐,号召诸侯辅助他“致天之罚”。在周武王伐纣之时,武王也发布《泰誓》,指责商纣王“弗敬上天,降灾下民”,宣称自己是奉天伐罪,要求诸侯民众听从自己的命令,武力推翻商朝。自此之后,不论是农民起义,还是权臣夺位,往往都要通过制造舆论,寻求广泛的社会支持。例如陈胜、吴广先是通过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制造神迹,

接着又在杀死秦尉之后斥秦暴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的口号,从而发动了大泽乡反秦起义。王莽代汉之前则“折节力行,以要名誉”(《汉书·王莽传》),在堕落腐败的西汉政权中独树一帜,以至于全国吏民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一十二人上书要求其受禅代汉<sup>[12]</sup>。可见,政治传播的重要性。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更迭王朝之历史无不伴有舆论制造之行为。这种舆论制造是一种以动员社会为目的政治传播。这种政治传播与其他以维护政治统治为目标的政治传播活动一起构成了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政治传播体系,维系和推动了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演进。

综上所述,政治传播在中国古代政治的各个环节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政治传播的概念虽起源于现代西方,但其实践却遍布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各国政治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同样,各国的政治传播也是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必须将其置于特定国家的政治历史环境中才能被深刻理解。因此,中国有理由也有必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而丰富的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实践无疑能为这种理论的建构乃至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应当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

## 参考文献:

- [1] 杨光斌. 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67.
- [2] [德] 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70.
- [3] [美] 阿尔蒙德,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策略[M]. 曹沛霖,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26.
- [4] [英] 芬纳. 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G]//统治史:卷一. 马百亮,王震,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89.
- [5] 葛荃. 教化之道: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化路径析论[G]//江荣海. 传统的拷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90.
- [6]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44.
- [7] [加] 伊尼斯. 帝国与传播[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8] 孙旭培. 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25.
- [9] 潘祥辉. 官僚科层制与秦汉帝国的政治传播[J]. 社会科学论坛,2010,(21).
- [10] 赵汀阳.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42.
- [11] [英] 罗素. 权力论:新社会分析[M]. 吴友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97.
- [12] 钱穆. 国史大纲: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6:152.

[责任编辑:张莲英]

# 民族国家间差异性对国家形象塑造的制约

## ——以政治价值观与民族文化为讨论基点

李彦冰

(北京联合大学 新闻与传播系,北京 100191)

**摘要:** 民族国家间差异性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制约因素,从政治的角度看,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和民族文化的不同与国家形象的关系最为密切。从全球的政治现实看,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是一个全球性宰制话语,在这一话语下,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塑造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首先作用于人的认知系统,通过改变认知影响人的态度,进而改变人的行动;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所带来的认知和交流的障碍会对国家形象产生重要制约和影响;刻板印象和民族文化偏见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一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关键词:** 民族国家;国家形象;政治价值观;民族文化;刻板印象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3)02-0033-03

收稿日期:2012-12-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11&ZD075)

作者简介:李彦冰(1980—),男,河南濮阳人,讲师,传播学博士,从事政治传播研究。